

复旦大学博士丛书

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

李祥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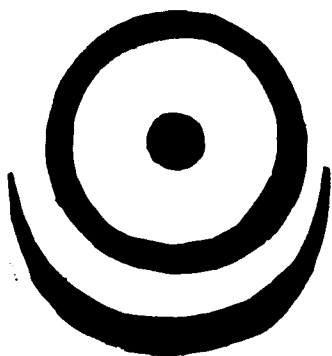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博士丛书

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

李祥年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汉代传记文学的历史渊源	13
一、中国古代传记创作源远流长的传统	13
二、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文学及其影响	19
第二章 司马迁的传记文学观	33
一、司马迁传记写作的主、客观条件	33
二、司马迁传记文学观的主要方面	35
第三章 《史记》的传记文学意义及其局限	49
一、《史记》增强了古代传记的历史容量	49
二、《史记》提高了古代传记的审美功能	51
三、《史记》丰富了古代传记的艺术表现形式	57
四、《史记》人物传记的历史局限	58
第四章 《汉书》及汉代其他的史传创作	66
一、《史记》的流播与补续	66
二、班固史传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	69
三、《汉书》人物传记的特色与成就	72
第五章 正史传记的跌落（上）	90
一、魏晋史学的繁荣与史传价值的衰减	90
二、陈寿与《三国志》的人物传记创作	93
三、范曄与《后汉书》的人物传记创作	103
第六章 正史传记的跌落（下）	116
一、南朝史传的官修色彩	116

二、沈约与《宋书》的史传创作.....	118
三、萧子显与《南齐书》的史传创作.....	123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上）.....	127
一、从目录学看汉代史传的附庸地位.....	127
二、儒家经学对传记创作的影响与束缚.....	130
三、魏晋南北朝杂传的繁荣及意义.....	133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中）.....	141
一、时代风云的多点折射：人物别传	141
二、文人心态的曲折表露：《文士传》、《高士传》 及《孝子传》.....	153
三、动荡年月的郡国之书：地方人物传	160
四、贵族阶层的金色族徽：家传	163
五、佛教东渐的雪泥鸿爪：僧侣传记	166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下）.....	183
一、杂传的传记文学成就.....	183
二、杂传的艺术局限.....	193
后记.....	199

绪 言

人类自古便有着保存其自身言行实录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可以说仅次于保存其自身存在的本能。由这一愿望而最终孕育了一种融历史学与文学为一体的艺术创作形式——传记文学。

传记创作是人类最早的文化活动之一。然而由于种种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的文学创作形式的传记文学,其各种艺术规定性:诸如选择并再现独特的个人生平,在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亦刻画出传记主人公的个性,艺术地展示真实的人生等等,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并没有在传记的实际写作过程中得到自觉的遵循。中国古代的人物传记常常成为其他学术门类,尤其是史学的附庸。这便也造成了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对传记文学创作的忽视。

在传记文学创作日益蓬勃发展的今天,对这一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做一历史的追溯与探索,从它的发生及发展过程中,寻觅并总结其创作观念的演变及写作艺术的得失,将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这一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的发展历史有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也将为今天的传记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出于上述的动机与愿望,本书选择了中国早期传记创作——汉魏六朝的传记文学为课题,进行了重点研究,并期望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最初的发展轨迹,做一粗略的勾勒。为此,我们首先将从考察中国古代传记创作的原始形态入手,因为如果把以司马迁、班固等人的史传创作为代表的汉代传记文学创作,比作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那么,考查它的壮丽景观,不能不首先回溯到作为其源头的那一道道涓涓细流。

我国上古时代人们的文化实践中,已经萌发了传记文学创作的最初形态。独重世系,言辞简略的帝王谱牒和想象丰富,文学性强的英雄史诗是作为初级形态之传记创作的两种最基本的形式。从这两种基本形式以及它们各自所体现出的不同的创作特征中,正孕育了我国古代传记写作中互相糅杂的两种基本倾向——谨严简省的写实主义和浪漫夸张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任何一种精神倾向一旦形成之后,便必然将以其强大的历史持续力,施予后代以鲜明的影响。汉代的史传创作中,多有“世表”、“年表”一类对历代君侯所谓“综其终始”式的简略记录;而“本纪”、“列传”篇章中则不乏运用瑰丽雄奇的艺术渲染对历史人物进行细致生动的描绘。这些正可以看出上古传记两种基本倾向在汉代传记文学中的延续与发扬。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随着社会形态的急剧变革和政治局势的波诡云谲而来的,是一个诸子百家蜂起,思想文化大放光彩的时代。人们在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实践中,进一步启发了对人类自身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主体地位的认识。这便为传记写作摆脱僵化单调的帝王谱牒和神秘虚幻的英雄史诗,并走向更大的繁荣,提供了其历史可能性;而人们随着政治斗争的深入而日益增强的要求以史为鉴的历史自觉,则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春秋》之后,这一时期纷呈迭现的历史著作如《左传》、《战国策》、《国语》等等,不仅以其深广的历史容量为后世的传记写作准备了丰富的素材,更重要的是,它们无不表明出作者在寻求更大范围地把握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注意到对人物个性的描述——尽管这种个性描述也许尚不是出自作者的自觉,或仅是作为一种劝世喻教的手段——但它却肇示了传记文学的发展方向,而汉代的史传文学创作,则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我们还看到,古代普遍信奉的“天命”、“人德”相辅依的观念,日益加深了人们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各种形

式的文学创作成为了进行伦理喻教的重要途径。先秦时代的历史著作，后人或奉之如“经”，或目之为“史”，但无人不重视其在促进人们之道德完善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而洋溢在先秦历史著作中的这种强烈的伦理意识与理性精神，势必将成为后代传记写作所继承的又一份精神遗产。汉代史传创作的旨归，依然在于通过对人事的叙述来阐明作者的伦理意识，进行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道德批判，高明的是，在司马迁、班固等人的笔下，这种理性精神的体现，往往披上了有着浓厚人文色彩的外衣。

正如人们总要将汉代誉为中国史学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人们在论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时，亦每每将汉代认作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而所有这一切，无不和里程碑式的历史巨著《史记》的出现有着重大的关系。因此，司马迁及其《史记》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势必成为每一个致力于汉代史学或传记文学研究的人首先面临的课题。本书的第三章所着重探讨的是司马迁的传记文学观。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虽然很难说《史记》是独立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创作，但既然承认了它所蕴含的巨大的传记文学价值，那么，司马迁在指导其《史记》创作的各种观念中势必包含了他对于传记写作的认识——对此我们不妨称作司马迁的传记文学观。尽管这种传记文学观所呈现的形态可能是非系统、非自觉的，但它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史记》的传记文学意义乃至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在汉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有益的。

我们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司马迁的传记观进行把握：

一、继承《春秋》褒贬讽劝传统，重视传记文学的社会功用。

在一度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对于社会人生的指导评判作用进一步被人们接受；在文化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褒善贬恶、拯世济物的能动精神，

亦进一步成为人们的自觉。司马迁固然很难说是一个很纯正的儒家,但他对于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所蕴寓的巨大的社会功用是深信不疑的。对此他屡有表述,而司马迁对儒家经典的这种理解,也结合了其本身作为一个积极进取的历史学家要求对现实社会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因此司马迁毫不讳言他以《春秋》继承人自居的著述宗旨。这一宗旨贯穿在整部《史记》的写作中,更集中地体现于他的人物传记。《史记》中包括“本纪”、“列传”在内的各种体例下的写作内容,无不有其明确的价值取向。有关这一点司马迁在《自序》中论之甚详。撮其要乃“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从人物不同的社会实践及其命运中稽出“成败兴坏之理”以镜鉴当世。

二、尊重历史发展规律,追求人物传记的真实性。

司马迁处于一个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思想文化极大繁荣的时代。日益巩固与发达的社会经济基础为他生活和学术实践领域的拓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而前代文化成果的丰富积累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断进步则为其在历史观方面超越前人提供了可能性。司马迁历史观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更为自觉地尊重历史发展规律,进一步摆脱了“天命论”的束缚。这种历史观体现在其具体的人物传记写作过程中,则促使他萌发了追求传记之真实性的自觉要求。首先,司马迁认为总结并认识历史人物的命运,必须将之置于客观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考察,不能简单地加以唯心主义的解释。例如他认为项羽的失败,是楚霸王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自身的社会实践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并非“天亡我”;同样,蒙恬的受诛亦绝非如其本人所言乃“绝地脉”的结果,而是由于他未能顺应客观历史的要求,从而酿成大祸。其次,司马迁认为记述前代历史及人物生平事迹,在史料的选用上需得有严谨的求实精神。因此“考而后信”成为他在传记写作中所严格奉守的原则。他提出对于传记素材的甄别取舍,要以“雅驯”“不虚”为标准,要考信于具有

权威性的经典文献。而且,司马迁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并没有单纯体现在对经典文献的徵引参照上,重视亲历访问,实地调查,亦构成他自觉追求传记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着眼于今,重视为近代人物立传。

司马迁是极为重视历史和传记写作的社会功用的,与此相联系的则是他对于近代史事及人物的重视。他认为借鉴史事以自镜当代之存亡,未必一定要借助上古的往事,通过考察近当代君主大臣的尊宠废辱,亦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自觉地为近人立传的传记意识以及在此指导下的实际创作,具有深远的传记文学意义,它不仅促使中国古代人物传记更进一步从上古祖先传记的神秘氛围中脱离出来,同时也为传记文学的创作更进一步拓展了视野,并使之具有了更强的现实意义。

以上几个方面的归纳分析,旨在说明司马迁在史传写作方面已有了日臻成熟和系统化的认识,而《史记》在人物传记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便不再仅是时代的厚赐。

《史记》开创并代表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史记》的出现,是“海内一统”的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现实和作为一名优秀史学家的司马迁本身所具备的各种主观条件统一作用下的必然产物,这是我们在阐述《史记》伟大的传记文学成就时所必须首先加以认识的。

过去的包括文学史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论著每当论及《史记》时,无不极誉其在历史散文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忽略了其在传记文学创作方面的价值。本书则以相当的篇幅论述《史记》的传记文学意义。其成就及意义主要表现在:

首先,《史记》打破了以往史事载述的格局,它努力通过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物命运的交织组合,来展示出时代沿革的历史面貌。因此在记叙历史人物生平方面,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并第一次向

世人展示了传记文学如此巨大的历史容纳力。它是有着明确意识地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形式来包罗并再现浩瀚历史的第一次,也是最辉煌的一次尝试。对以后的历史及传记写作,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其次,《史记》为纷繁众多的历史人物立传,并没有局限于单纯的流年纪事,而是更多地注意刻画出人物不同的个性特征,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因此提高了中国古代人物传记的文学审美意义。《史记》作者之获得其人物传记较高审美意义的几条主要途径,对后代的传记文学创作亦颇有借鉴价值。

再次,《史记》开辟了多样化的传记途径,丰富了传记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史记》出现之前,中国古代的人物传记多为连缀于史书中的记事片断,尚未有其确定的形式。《史记》不仅确立了“纪传体”作为人物传记的主要形式,更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挥运用了这一形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艺术表现能力。

当然,《史记》毕竟还是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初期时的产物,和封建时代的任何精神产品一样,它无法避免地受到其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制约,并体现出创作者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的思想局限。即使是仅从传记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认识《史记》,它依旧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时代局限。对此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过分强调传记的伦理教化作用,因而削弱了人物传记中对人物性格及形象的刻画与塑造。

二、过多地从作者个人情感出发,局限了对传记主人公在客观历史进程中地位与作用的正确评价。

三、过于追求奇特的传记效果,从而影响了—些人物传记的历史真实性。

《史记》的问世开肇了汉代史传文学创作的全盛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史传文学的创作,这些写作犹如一道道涓涓细流汇

合而来。使汉代史传创作这一传记文学主流波澜起伏，常盛不衰，并终于在班固的时代形成了又一次高潮。

当我们对《史记》之后汉代史传写作的发展，以及形成汉代史传创作又一次高潮的各种客观因素有所了解以后，将对标志着这一次高潮的史传著作——班固的《汉书》进行着重的讨论。

在班固所处的时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较之以往更为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思想已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一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给班固的学术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其特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其个人的人生经历，更进一步决定了他那歌颂大汉统一、维护封建王朝正统思想的学术意识。这一学术意识支配了《汉书》中人物传记的写作，并使之具备了与司马迁《史记》所不同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对待传记人物的道德伦理评判上，班固体现了比司马迁更为自觉而严格地奉守封建王朝正统思想的倾向，这种倾向对人物传记审美功能的发挥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其次，《汉书》的人物传记更为重视原始史料的保存及运用，从而扩大了人物传记的历史容量和认识价值，也丰富了再现人物生平及形象的手段，但也造成了某些传记冗长而琐碎的趋势。

班固作为一名富于才华的历史家、文学家，其《汉书》中的人物传记创作，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有些传记篇章如《李陵传》《苏武传》等，在塑造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活动等方面，较之《史记》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在人物传记的形式上，《汉书》继承借鉴了《史记》的经验并有所发展与创新，如“合传”形式的更为灵活的运用，“类传”范围的扩大，以及大量人物小传的出现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对班固《汉书》以及汉代其他史传创作的论述，我们还试图说明由西汉到东汉，其间正经历了封建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日趋严密的过程，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核心的整个封建文化氛

围本身亦已形成一股强大而无形的社会力量日益加深地控制了——一个活动于其中的个人。从司马迁的《史记》到班固的《汉书》，汉代的正史人物传记创作，走的亦是一条日益自觉地维护与宣扬封建正统思想、为封建王朝的统一和巩固服务的道路。这使汉代史传创作在内容选择及艺术表现形式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越来越大的局限，作为一种艺术的汉代史传创作不可挽回地走上了日趋衰落的道路。

面对汉王朝的覆灭，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及崩溃，无论是在上层统治者还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以史为鉴”的意识都大大地加强了，并由此而促成了魏晋以后史学著述的大繁荣。然而这种繁荣的史传创作，却并未能给这一时期的传记文学创作增加独特的光辉，相反，在人们的心目中，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传创作，作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一个高峰，已经成了无可挽回的过去。

本书的第五章便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期两部最主要的史传著作《三国志》和《后汉书》的研究，来探寻汉代以后史传跌落的原因以及所经历的历程。

东汉以后，史传的写作已被进一步纳入为统治阶级政治利益服务的轨道，同时，统治阶级集团对于史传作者的要求与控制亦日益严厉起来。史传作者的个人意志的发挥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局限，他们只能在其史传创作中极力迎合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而个人的愿望只能通过极其隐晦曲折的方式来进行表达，那种“成一家之言”的社会基础已被大大地削弱了。这可以说是魏晋以来史传跌落的最主要的社会原因。

先出仕蜀汉后又入晋的《三国志》作者陈寿，便陷入在这种个人的主观动机与社会现实的实际要求相矛盾的境地中。作为一个生长在蜀地，曾在蜀汉政权下担任官职并享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他主观上有意提高蜀汉的地位，但由于晋承魏统，作为在晋政权下谋生的他，又无法不承认魏的正统。同时他还要顾忌到晋代统治阶

层的好恶,为其多作回护,被置于这样一种尴尬境地中的《三国志》人物传记创作,常显得或揄扬太过,或贬损失当,顾此失彼,捉襟见肘,通过对此的深入分析,我们可对这一时期的史传创作,其传记文学价值的跌落及其社会原因有一个具体的感受。

中国古代史传传记文学价值的跌落还有一个著述思想上的主要原因:即中国古代的史传创作,一直只重记叙而轻阐释。因为史传历来只作为史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传者在进行传记写作的时候,除了履行其伦理评判的职责外,主要的目的乃在于记叙史事的更迭,朝代的沿革,君主的替代以及各等人物的生平行事。至于是怎样的动因导致了人物如此的行为?哪些主客观因素造成了人物如此独特的人生?以及这一独特的人生又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则很少在传记中得到阐释。在这种传记意识指导下的史传创作,人物的性格形象只会越来越苍白,传记的文学色彩只会越来越淡薄,从而造成了其传记文学价值的跌落。本章亦结合《三国志》史传创作的实践论证了这一点。

《后汉书》的写作,虽然晚于《三国志》百余年,然而它所传记的人物,绝大多数却早于三国时期。从《三国志》到《后汉书》,史传作者就其传记观念来说,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如果说《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努力罗列蜀汉人物以提高蜀汉的地位,这是将史传创作视作表达自己个人愿望的一种方式,则《后汉书》的作者范曄亦是在借助人物传记这一艺术形式以表达自己对于挽救国家颓势的愿望及见解。因此其所重视的依然不是对传主生平活动及主客观动因的阐释以及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作者本人蕴寓于传记中所谓的“精意深旨”。本章在论述《后汉书》人物传记内容特色及传记成就的同时,亦着重地指出了这一严重影响史传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而发展的创作倾向。

通过对《三国志》和《后汉书》人物传记写作得失的分析,希望能够论证中国古代的史传创作最终未能在传记文学这一独特的文

学领域保持其独立的、主导的地位，而沦入为统治阶级政治利益服务的史学附庸，这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史传创作本质特征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三国志》、《后汉书》以后，史传创作已无力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担负其主导的作用，这从宋、齐、梁、陈诸朝的史传创作中亦可以得到证明。南朝诸代出现的史传创作大多带有浓厚的官修色彩，因而更进一步被纳入了统治者集团的控制范围，从而无法发挥其作为传记文学的独立价值。两部南朝时期所创作、至今尚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史传著作——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便是两个极为典型的例子。通过对这两部书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史传跌落的原因及其过程。

沈约《宋书》的撰作，自始至终是遵循统治者的“御意”而产生的一部作品。这种客观的历史条件已经决定了其作者无法挽回中国古代史传创作的颓势，《宋书》也不可能在中国古代史传走向没落的过程中迸射出奇异的光彩。替统治者涂脂抹粉，讳恶扬善成了它的显著特色，而南朝日益炽烈的门阀士族制度和作者个人的贵族立场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宋书》中人物传记在传主选择上的充分自由，使其内容范围日趋狭窄。我们并不忽视《宋书》在为贵族阶层立传中所取得的传记成就，然而无法否认的是，所有这些成就已不足推动史传创作的继续发展了。

皇室成员萧子显所作的《南齐书》，不仅未能脱离为统治阶级政治利益服务的轨道，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依附得更为紧密了。同时在艺术表现上，它更进一步流入了单纯的史事记录，或者传主生前文章疏奏的载录，已无文学性可言。

通过对《宋书》和《南齐书》史传创作的论述，我们也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古代史传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进程中跌落的必然结局。

就在史传这一人物传记写作样式作为传记文学而走向跌落的

过程中,新的传记形式开始悄悄崛起。史传之外的各种人物传记写作逐渐繁荣起来,并开始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担负起主导的作用。为了和正史传记相区别,这些传记之作在以往的图书分类中常被统称为“杂传”。

在论述魏晋杂传的繁荣及其意义之前,我们必须对这以前的以史传创作为代表的古代传记文学在学术领域所占有的地位有所认识。由于儒家经学的巨大影响与束缚,决定了汉代以前的传记写作为“经学”服务的性质,同时也决定了传记在内容范围和数量上的局限性,因此使它在当时很难享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而汉代以后的史传创作,作为被统治阶级控制最为严密的一种文化实践,在其精神实质上并没有超出“释经”的藩篱,那种借助人与事的载录以阐述及宣扬封建正统观念的倾向一直是史传创作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因此它不能也不可能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谋得一席独立的地位。

进入魏晋时代以后,动荡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给以儒家学说为支柱的传统观念以猛烈的冲击,也为这一时期杂传的繁荣提供了特定的社会及思想背景。在本书的第七章中,我们将结合这一背景从传记创作规模的扩大,传记内容及形式的丰富,以及传记创作队伍的壮大等方面具体论述魏晋杂传的繁荣。

通过这些论述,也旨在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传记已不再仅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仅是少数史家为统治阶级政治利益服务的手段,它已变成更大多数人通过记录旧事和传记人物来表达其个人“志向”的一种途径或方式。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经日益鲜明并最终确立了。

杂传所代表的传记文学创作终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而开始实现价值,这使它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传记文学的功能,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传记创作,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其本身亦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人物传

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的传记文学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由于年代的久远,大多数的“杂传”作品均已散佚,后人极难窥其原貌,故而也造成了长期以来对“杂传”的传记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地位的轻视乃至忽视。我国已故的著名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先生生前曾开辟从前人史籍中辑录“杂传”片断以充实研究基础的方向,笔者多年来亲受朱先生指导,于《三国志》注、《后汉书》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水经注》以及后世类书,方志中苦苦勾稽孤文片记,虽未可称已窥得“杂传”全貌,但终可得以结合魏晋杂传的诸种主要类型的研究,就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思想内容的影响做一初步的探讨,并且在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杂传”巨大的传记文学价值与成就以及它们对后世的影响。所有这些,将构成本书最后三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汉代传记文学的历史渊源

一、中国古代传记创作源远流长的传统

今日被一般人认作是新兴学科的传记文学,实际却是人类所掌握并从事的最古老的写作样式之一。甚至曾经有研究传记文学史的学者,将传记文学的发生,溯源于人类本能的驱动。《美国传记文学史》的作者爱德华·奥尼尔(Edward H. O'Neill)就说:

“人类保存其自身实录的愿望仅次于其保存自身的本能,由这一愿望而产生了历史学与传记文学的姻亲艺术。”^[1]

这种说法的正确与否固然尚会产生争议,然而,这种将传记文学的创作视为人类最早的文学活动之一的认识,则无疑是正确的。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国度之一,即便是在上古文明的萌芽时期(这里姑以文字的产生为标志),记述祖先以及当代人物的言行事迹,便已成为人们文化行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小屯殷墟出土的刻字甲骨表明商代人已经开始运用甲骨文字记载史事,内容包括帝王及官僚的名字、战争、祭祀和狩猎、史事发生的月日和地点等等^[2]。据说当时天子、诸侯的言语行事,已有专人负责记录。《隋书·经籍志》言: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以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又《春秋国语》引周志,郑书之说,推寻事迹,似当时记事,各有